

## 关于赵鞅尚贤用人路线的特点

章 启 勋

赵鞅在晋定公时,虽然“名为正卿”,但其势力却已跃居六卿之首,达到了“实专晋权,俸邑侔于诸侯”<sup>①</sup>的程度。究其原因,除了史学界已经论及他所实行的经济、政治改革和对外征伐之外<sup>②</sup>,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毕生坚持了一条尚贤的用人路线。那么,他所坚持的这条路线具有哪些特点?起到了什么重大历史作用?拙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看法。

### 一

期贤爱士是赵鞅尚贤用人路线的第一个特点。赵鞅作为春秋末期矢志改革的政治家,深知“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sup>③</sup>的治政的道理。因此,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期贤心切,爱士若命,并且将有无贤才的辅佐视为自己事业成败的关键。从现有的文献材料看,赵鞅期贤心切的事迹是非常突出的。《吕氏春秋·贵直》有如下记载:

赵简子攻卫附郭<sup>④</sup>,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于屏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杼而叹曰:“呜呼!士之遯弊,一若此乎?”

仅字面而言,这段材料是在讲赵鞅临战而却阵、怨士之遯弊。但实际上,它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即位之初故意淫乐而求贤才一样<sup>⑤</sup>,是在有意临阵躲避而寻求敢于直谏的贤才。作出这种推断的根据是:其一,当赵鞅叹息“士之遯弊”之时,果然有位名叫行人烛过的人冒死讲述了不怨士弊而怨君弊的道理。其二,当赵鞅听了行人烛过的谏言之后,“乃去屏蔽屏櫓而立于石矢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之”<sup>⑥</sup>。其三,当赵鞅认定行人烛过确系自己期望得到的那种贤才以后,深有感触地说:“与其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sup>⑦</sup>他的这句话其实是在给自己在战前远立和“居于屏蔽屏櫓之下”开列注脚,言外之意就是:宁愿冒战败而丧失革车千乘之风险,也不愿放过借此觅索和考察贤才的机会,这正是赵鞅期贤心切的明证。除此之外,《国语·晋语》也有类似的记载:

赵简子曰:“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将焉用之?”简子曰:“良臣,人之所愿也,又何问焉?”

从这段材料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赵鞅在治政过程中,不仅期望得到自己统治范围以内的贤才,而且连身居于自己政敌营垒之中的良臣也希望得到。针对这种情况,史黯毫不讳言地向他说明:“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致于难;君出在外,又不能定,〔反〕而弃之,则何良之为?若弗弃,则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将勤营其君,复使立于外,死而后止,何日以来?若来,乃非良臣也。”经过史黯的这番解说,虽然赵鞅自感得到范氏、中行氏之良臣很不现实,但他期贤之心未已,仍然坚持不懈地利用各种渠道、挖掘对他治政有用的贤才。比如《国语·晋语》又载:

赵简子问于壮驰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壮驰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

“臣闻之，国家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馀。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

可以想见，赵鞅在此是在专就“东方之士孰为愈”的问题向壮驰兹进行调查。壮驰兹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但是，却就赵鞅下士求贤的行动进行了祝贺，并根据赵鞅“自以为不足”和“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又求贤人”断定其事业将兴。从其未竟的语势可以清楚地看出，壮驰兹后来无疑给赵鞅荐举了“东方之士”中的贤才。经过上述分析，赵鞅期贤心切的事迹得到了较为明确地反映。他的这些事迹在当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社会影响，各方有为之士深感其诚，纷至沓来，云集到了他的麾下。当他们来到赵鞅身边以后，受到了赵鞅的百般珍视和爱护。这就是接着要谈的另外一个方面问题，即赵鞅爱士若命的事迹。《吕氏春秋》有这样一段记载：

赵简子有两白驪而甚爱之。阳城胥渠处黄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医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入通，董安于御于侧，愠曰：“诺！胥渠也，期吾君驪，请即刑焉！”赵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屠人杀白驪，取肝以与阳城胥渠。

笔者认为，上述胥渠之事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胥渠本来无病，却佯装患病前来索取赵鞅的白驪之肝，以此试探赵鞅是否确有爱士之心；其二，胥渠确已身染重疾，按医嘱急需白驪之肝入药。不过，无论属于哪种可能性，赵鞅视白驪为心爱之物是毋庸置疑的。令人叹服的是，他得知胥渠急需白驪之肝挽救性命的消息以后，毅然决然地忍痛割爱，杀死白驪，掏出驪肝，赐给了胥渠。这件事情，对于赵鞅来说的确是一场考验。但结果证明，赵鞅爱士胜过了喜爱白驪。赵鞅之所以能够作出这种决断和选择，是因为他深深懂得，贤良之士的生存是自己事业不断兴旺的重要基础。倘若不重视这个基础，对其病患疾苦不予关心，闭目塞听，高高在上，那么，日长月久，麾下的离心作用必将逐步加大，以致造成基础的瓦解。基础一旦瓦解，自己事业的成功也就必将化为乌有。君主爱士，士则尽忠。胥渠索取驪肝之事以后，时隔不久，赵鞅兴兵伐翟。在这场战争中，正是那位胥渠，率领1400名将士英勇奋战，顽强杀敌，从而取得了这场战争决定性的胜利。赵鞅不仅爱惜自己内部的贤良之才，对那些从异国他邦投奔而来的贤良有为之士也爱护备至。关于这个问题，《吕氏春秋·期贤》的一段记载较为典型。

赵简子昼居，喟然大息曰：“吾欲伐卫十年矣，而卫不伐。”侍者曰：“以赵之大，而伐卫之细，君若不欲则可，君若欲之，请令伐之。”简子曰：“不如而言也，卫有士十人于我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义也，而我伐之，是我为不义也！”

这段材料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赵鞅的期贤之举虽然招徕了卫国的10名贤士，但这10名贤士对生养他们的故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因此，在赵鞅图谋攻打卫国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言鞅此举不义。赵鞅为了继续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又不致使他们的心理和感情上受到打击和创伤，于是毫不吝惜地放弃了图谋已达10年的伐卫计划，其爱士之心可谓细腻周到。谈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赵鞅爱士是爱士，可说他爱士若命恐怕有点危言耸听吧！其实，赵鞅爱士若命非但不虚，而且尤为具体。据《韩诗外传》记载，赵鞅的贤臣周舍去世以后，他悲伤地说：“今舍死，吾亡无日矣！”对于一名贤臣的死去，赵鞅不但具有如丧考妣的痛楚之情，而且将他的死去同自己的生命乃至政治上的灭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赵鞅具有爱士若命的政治品格吗？

## 二

善于纳谏是赵鞅尚贤用人路线的第二个特点。赵鞅是一位从晋国奴隶制的襁褓中成长起

来的封建君主。因此，他同春秋后期所有的新兴封建君主一样，一旦大权在握，往往容易出则游射于林苑，入则燕乐于宫室，很难也不可能独自周全地了解政况民情和悉心反思本身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臣属特别是贤哲们的经常不断地如实谏政对赵鞅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从现存的有关文献材料看，赵鞅善于纳谏的特点非常突出。如果稍作剖析，他的这个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能以闻过则喜和知错即改的实际行动鼓励贤才们涌跃进谏。前文中，我们谈了周舍的有关事迹。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位周舍投靠赵鞅的目的以及赵鞅对他所采取的态度。周舍投靠赵鞅的目的何在呢？关于这个问题，《韩诗外传》有如下记载：

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对曰：“愿为鄂鄂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所记，月有所就，岁有所效也。”

这段材料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周舍投靠赵鞅的目的既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地位，而是为了做个“鄂鄂之臣”。所谓“鄂鄂”，亦即“谔谔”。《楚辞·惜誓》有“或推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谔”的句子。原来，周舍是专门来同赵鞅进行直言争辩的！“墨笔执牍，从君之过”说得更为具体、更加形象了。他是要随时握笔操牍，监视赵鞅治政的过错，不断地进行记载并敦促其及时改正。赵鞅对于这样一位成天直言争辩和专记自己过错的人的态度怎样呢？《史记·赵世家》有载：

“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罪。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

《韩诗外传》亦云：

“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吏于门下，抱笔执牍从之书过。简子与之居。”

这两段材料说明，周舍在世时，赵鞅对其也是特别器重的。赵鞅之所以如此器重周舍，是因为周舍能“从君之过”。这就反证出：赵鞅的确能够做到闻过则喜。认识了这个问题，对赵鞅在丹墀碧落的场合盛誉周舍为“一狐之腋”、赵鞅“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与之居”等等问题就全然理解了。赵鞅闻过则喜的实际行动，无疑对那些忧政而进谏的贤臣们是一种极大的鼓励。贤臣们的涌跃进谏，反过来又使得赵鞅能够随时随地听到来自众多贤良的治政建议和意见了，使他治政过程中的某些过错和失误得以及时克服和纠正。这就是赵鞅善于纳谏、闻过则喜条件下的知错即改。《国语·晋语》记载：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吾将往焉，若见垒，是见寅与吉射也。”尹铎往而增之。简子如晋阳，见垒，怒曰：“必杀铎也而后入。”

赵鞅要尹铎毁掉晋阳的“垒”，尹铎却相反地增高了“垒”，赵鞅因此决意先杀尹铎而后入晋阳。在这种情况下，贤臣邰无正认为尹铎先前所说的“思乐则喜，思难而惧”和“委土可以为师保”深切肯綮，而赵鞅在此事的处理上完全是是非未分、黑白颠倒！故此，在尹铎即将死于陌刀手的屠刀之下的关键时刻，邰无正正辞严地向赵鞅进谏道：“若罚之，是罚善也，罚善必赏恶，臣何望也？”赵鞅听罢，一方面自责“吾几不为人矣！”一方面“以免难之赏赏尹铎”，以实际行动改正了自己的错误<sup>⑥</sup>。试想，如果赵鞅没有闻过则喜和知错即改的雍容大度，岂不在此事上铸成终身大恨？尹铎由于邰无正的及时进谏，不仅幸免一难，而且获得了丰厚的赏赐。可是，他早先同邰无正的私交如何呢？《国语·晋语》对此事的记载是耐人寻味的：

初，伯乐（笔者按：伯乐即邰无正）与尹铎有怨。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辞曰：“吾为主图，非为子也。怨若怨也！”

由此可见，邰无正同尹铎之间早就结有私怨。但是，由于赵鞅具有闻过则喜和知错即改的宽阔胸怀，所以在他即将误杀尹铎之时，邰无正能以赵氏基业为重，排除私怨而力为主图。

臣望君而行，君正则臣直。在赵鞅这位尚贤君主的麾下，力为主图的贤臣何止邴无正一人！前文已经提及的史黯同邴无正相比毫不逊色。比如《国语·晋语》云：

赵简子田于嬖，史黯闻之，以犬待于门。简子见之，曰：“何为？”曰：“有所得犬，欲试之兹圃。”简子曰：“何为不告？”对曰：“君行臣不从，不顺。主将适嬖而麓不闻，臣敢烦当日。”简子乃还。

显而易见，赵鞅准备到晋君的苑囿——嬖这个地方去打猎，说明他专权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了。值得注意的是：当史黯以“君行臣不从，不顺。主将适嬖而麓不闻，臣敢烦当日”的理由进谏之后，赵鞅心领神会，当即放弃了“田于嬖”的打算。赵鞅这样做，并非出于对有名无实的晋君的尊重，而是从史黯的谏言中悟出了君行臣效必将危及自身的统治的深刻道理。这不能不说是赵鞅闻过则喜、知错即改的又一佐证吧！

现在，再谈谈赵鞅善于纳谏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即提倡直谏，视进谏刻言之臣为忠贤的事迹。前人在评价赵鞅的时候，曾讲过这样一句话：“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sup>⑥</sup>。诚然，能否听取臣属进谏的刻言并不是判断贤主或昏君的唯一标志。但是，在古代典籍中确有不少史料记载了赵鞅在纳谏中不仅能潜心听取臣子们进谏的刻言，而且能将这光明磊落、心底坦荡的贤臣视为自己政治生活中必须依靠的中坚力量。在对赵鞅进谏方面，要说言刻，行人烛过的谏言可算是刻薄之甚了。在攻卫附郭的那次战斗前，赵鞅有意藏身避矢，长叹“士之邀弊”时，行人烛过一针见血地进谏道：“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在这里，不明真相的行人氏分明是在当面咒骂赵鞅无能！赵鞅面对如此刻薄的谏言，虽然也禁不住赧然作色地说道：“子谓寡人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但是，当行人氏列举献公用此士兼国十九、惠公用此士为秦所败以及文公用此士定霸天下的史实，说明君贤则士勇、主昏则士弊的深刻道理以后，赵鞅立即率先入阵，“一鼓而士毕乘之”，收到了“战斗之上，枪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死”的显著效果。这种效果，实质上是赵鞅善于纳谏、提倡直谏、视进谏刻言之臣为忠贤的直接效果。又如《吕氏春秋·达郁》云：

赵简子曰：“厥也爱我，铎也不爱我。厥之谏我也，必于无人之所，铎之谏我也，喜质我于人中，必使我丑。”尹铎对曰：“厥也爱君之丑也，而不爱君之过也；铎也爱君之过也，不爱君之丑也。臣尝闻相人以师，教颜土色者丑，不质于人中，恐君之不变。”

这段材料告诉我们：尹铎的谏言之刻薄比起行人氏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反驳赵鞅的看法，说赵鞅是怜惜君主的丑陋而不怜惜君主的过错；自己是怜惜君主的过错而不怜惜君主的丑恶。不仅如此，他还直接指责赵鞅是个“敦颜土色”的丑君。象这种极端尖刻的谏言，赵鞅亦同样能够欣然接受，并将尹铎视为自己家臣中的心腹和贴己。无怪乎《吕氏春秋》专文记述：“此简子之贤也。……简子不贤，铎也卒不居赵地，有况乎在简子之侧哉！”赵鞅闻过则喜、知错即改，提倡直谏，视进谏刻言之臣为忠贤的卓越事迹，不仅有机地形成了他尚贤用人路线中善于纳谏的特点，而且充分体现了他那非同寻常的封建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巍巍气度！

### 三

黜庸进贤是赵鞅尚贤用人路线的第三个特点。在春秋晚期的晋国内部，由于赵鞅坚持改革路线，所以赵氏能在六卿专政的过程中独占鳌头。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少不学无术的庸才乃至政治投机商几经乔装打扮之后，乘改革之机，潜入了赵鞅的部伍。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严重地影响了赵鞅的政治生活，改革成果存在着将被断送的危险。因此，赵鞅为了扫除这种前进道路上的致命障碍，在期贤爱士、善于纳谏的同时，将黜庸进贤的问题纳入了重要治政议程。赵鞅的黜庸，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居心叵测的庸才实

行坚决地镇压；其二，对尸位素餐的庸才实行罢免官爵。首先，谈谈赵鞅对居心叵测的庸才实行镇压的情况。《说苑》云：

赵简子與栾激游，将沉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

赵鞅之所以将栾激处于沉河的极刑，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栾激之类正好同周舍等人相反，他们投靠自己的目的全然不是为了辅佐自己治政理业，而是为了他们自身官职的升迁和俸禄的增多。他们不学无术却钻营有术；他们辅政无道却投机有道；他们身为庸才却又妒贤忌能。请看！赵鞅好声色、好宫室台榭、好良马善御，栾激均能想方设法地为他办到，唯独不能为赵鞅“好士六年”尽点心力。说来也不足为奇，因为栾激深为担心和忌讳的就是：赵鞅身边贤良的增多必然导致自己的垮台。正因为如此，栾激这种人贯用的手法有两套：其一，不择手段地投君之所好，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升迁打通关节；其二，不遗余力地堵塞贤路，绞尽脑汁地为诋毁贤良大打出手。他们骨子里充满着对贤良的忌恨，又何肯为君主荐举贤才？赵鞅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中，完全看穿了这些庸才的腐朽本质和肮脏灵魂。他深刻地认识到：这类人的存在，是不断改革的障碍，是祸起萧墙的隐患，是贤路畅通的羁绊。因此，必须对他们施以极刑、坚决镇压。其次，谈谈赵鞅对尸位素餐的庸才罢免官爵和对贤良有为之士的录用提拔的问题。这一黜一进的人才更新，是从两个儿子身上开始做起的。《韩诗外传》云：

赵简子太子名伯鲁，小子名毋恤。

这就是说，伯鲁既是赵鞅的嫡长子，也就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太子的宝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伯鲁的学业和素质都证明：他没有继承赵氏基业和治理赵氏政务的天赋和才能，是个典型的尸位素餐的庸才。因此，赵鞅决意将其废黜。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废黜伯鲁的太子之位远非一蹴而就之事。其一，废除嫡长子继位的成法，本身就是一场影响极大的政治变革；其二，臣僚们早已认定伯鲁是自己的储君，各种关系千丝万缕，将其废除以后，可能会引起不少麻烦。况且，赵鞅废掉伯鲁的目的是要更立贤良有为的毋恤为太子。更立毋恤做太子，也同样存在困难，按《史记·赵世家》讲的，毋恤“母贱”，且为“翟婢”。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废长而立次，黜贵而进贱，实难说服群臣。但是，说来也怪，荒诞不经的相术师姑布子卿竟在赵鞅权力的作用下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重大政治矛盾。其情节如次：

姑布子卿见简子，简子遍召诸子相之。子卿曰：“无为将军者。”简子曰：“赵氏其灭乎？”子卿曰：“吾尝见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简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则子卿起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子卿曰：“天所授，虽贱必贵。”⑩

很明显，姑布子卿是赵鞅请来的，而请这位相术师来的目的就是借助“天”的力量解决更立太子的矛盾。两人象演双簧似的一问一答，最后由姑布子卿说了一句“天所授，虽贱必贵”的话，很快为毋恤应做太子定下了基调。为了更好地向臣僚们证明伯鲁当废和毋恤当立，赵鞅有意将两个儿子放在等量条件下进行了严格地比较和考验。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是这样记载的：

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恤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恤曰：“从常山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毋恤果贤，乃发太子伯鲁，而立毋恤为太子。

除此之外，《韩诗外传》也有类似地记载：

简子自为二书牍，亲自表之，书曰：“节用聪听，敬贤勿慢，使能勿贱。”与二子，使诵之。居三年，简子坐清台之上，问二书所在。伯鲁忘其表，令诵，不能得。毋恤出其书于袖，令诵，习焉。乃黜伯鲁

而立毋恤。

赵鞅从战略的高度着眼，黜庸进贤，连太子都毫无例外，可想而知，对其别的臣属就更不待言了。从事这种重大的政治改革，必然会遇到一些阻力。晋出公十一年，知伯攻打郑国。当时，赵鞅因病而遣太子毋恤率兵会同知氏作战。知伯醉酒之后，用酒灌击毋恤，为毋恤所容忍。知伯返晋以后，要求赵鞅废除毋恤的太子之位<sup>①</sup>。然而，赵鞅对此不屑一顾。此事证明，黜庸进贤作为赵鞅尚贤用人的路线特点之一，已经成为他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他既已决心从事这种改革，那么，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赵鞅黜庸进贤的客观效果，从毋恤身上也得到了明确地反映。毋恤即位之后，论其政绩，大凡可述四个方面：首先，他牢记赵鞅的遗训，一举完成了灭代的伟大事业；其次，他会同知、韩、魏、“尽分范、中行故地”，直接扩充了赵氏的经济实力，更进一步动摇了晋国奴隶制的经济基础；第三，继续实行尚贤用人路线，重用了才识俱全的张孟谈等人，联合韩、魏灭了知氏，更加巩固了晋阳这个战略堡垒；第四，他晚年未立五子，而传位于伯鲁之孙浣，从道义上获得了民心的支持<sup>②</sup>。从其政绩可以看出，赵鞅在当时黜庸进贤的过程中，更立毋恤为太子的战略决策体现了他政治上的灼识远见，完全正确。

#### 四

纵观赵鞅尚贤用人路线的三大特点，其实质就是：贤则亲而进，庸则疏而黜。如果论及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那么，笔者认为：他坚持这条路线，期贤爱士，招徕了行人烛过、胥渠、周舍、董安于、邰无正、少室周、尹铎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封建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使赵氏内部形成了一支长于韬铃的中坚力量；他坚持这条路线，善于纳谏，及时掌握了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信息，不断纠正了治政过程中的失误，做到了在各项改革和对外征伐中有据可依、有理可循，从而赢得了节节胜利；他坚持这条路线，黜庸进贤，使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人才结构不断得到了合理更新。特别是他一举打破了以往那种一成不变的嫡长子继承制的落后政治格局，从根本上完成了由贤继位的战略改革，从而保障了赵氏政治上的长期稳定和迅猛发展。赵鞅的尚贤用人路线是赵氏这个方兴未艾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正卿不断强盛的基础。他本人能够获得改革的成功，开创“名为正卿、实专晋权，俸邑侔于诸侯”的伟大业绩，靠的是这个基础；毋恤能够建立“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sup>③</sup>的卓著功勋，同样靠的是这个基础。赵鞅尚贤用人路线的特点和作用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改革路线一旦确立，取得各项改革成功的关键物质因素是与之相适应的人，这正是赵鞅矢志不渝地推行尚贤用人路线的根本原因所在。

注释：

①②③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④ 参见《侯马盟书》所载《侯马盟书与春秋后期晋国的阶级斗争》。

⑤⑥⑦⑧ 《吕氏春秋·贵直》。

⑨ 赵简子即赵鞅，下同。

⑩ 此见拙文《大鸟之喻新解》，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4期。

⑪⑫ 《国语·晋语》。

⑬ 参见《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